学术专论

溥仪的"初政"：1922—1924年逊清朝局的演进与出宫事件

杨一帆

[摘要] 民国建立以后，逊清朝廷的高层长期由以溥仪生父载沣为首的王公亲贵、师傅与内务府大臣组成，政治取向保守而谨慎，尚能与"在野"遗老及复辟活动保持一定距离。但是，随着溥仪开始"亲政"，这一结构逐渐被破坏。郑孝胥、罗振玉等富有政治野心与复辟倾向的遗老受到溥仪信赖，在清理皇产、加派南书房行走、内务府改革等活动中陆续涌入逊清朝廷，形成派系倾轧的局面，而载沣等旧臣则逐渐边缘化。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后。探讨溥仪出宫及复辟问题不能局限于"法理"层面，也需要重视1922年后逊清朝廷内部权力结构出现的变化。

[关键词] 逊清史　溥仪出宫　清遗民　内务府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5－0129－10

民国建立以后，逊清朝廷的高层长期由以溥仪生父载沣为首的王公亲贵、师傅与内务府大臣组成，总体上取向保守而结构稳定。但1922年前后溥仪开始"亲政"，这一权力结构逐渐被破坏，朝局动荡，部分原先"在野"的遗老卷入宫廷内部的政争，而载沣等旧臣则逐渐边缘化。这对于理解1924年的溥仪出宫事件乃至之后伪满洲国的历史都有重要意义。在逊清史研究领域，"清室优待条件"、古物处置与溥仪出宫是热点话题，但相关的探讨更侧重民国一方。[①] 对清室一方在1922—1924年的活动，既有研究则大多聚焦在郑孝胥、绍英等个别人物上。[②] 整体分析此期逊清朝廷的权力结构与人事关系，仍有较大空间，尚无从内部权势转移的角度阐释溥仪出宫者。

[收稿日期] 2023-02-14

[作者简介] 杨一帆（1997—　），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2101110823@pku.edu.cn

① 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李坤睿：《王孙归不归？——溥仪出宫与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季剑青：《"私产"抑或"国宝"：民国初年清室古物的处置与保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杨天宏：《"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李在全：《1924—1925年孙中山北上京津与逊清皇室的反应》，《史林》2022年第1期。

② 较有代表性的如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剑：《日记中的历史：绍英眼中的清末民初》，《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彭玉平：《王国维与溥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一、“摄政”格局与溥仪“亲政”

1913年2月隆裕太后去世后，逊清朝廷的实际最高领导者是载沣。载沣愿意遵守“清室优待条件”，在确保清室安全的前提下接受有限度的宫廷改革。大多数王公亲贵在辛亥革命后期对革命党持妥协态度，入民国后政治取向也与载沣相近。限于礼制，溥仪与王公亲贵隔阂颇深；同时受外界影响，溥仪又轻视王公亲贵，认为他们懦弱无能。①

溥仪“亲政”后仍在位的师傅有汉文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与英文师傅庄士敦。陈宝琛，官至内阁学士，1911年起任帝师。陈宝琛曾是溥仪“唯一的智囊”，不过随着溥仪的成长，年迈且谨慎的陈宝琛已难以满足其需要。②朱益藩，官至山东提学使、大学堂监督，1915年起任帝师，由陈宝琛所荐。③二人进退一致，在丁巳复辟期间均表现消极。④庄士敦，英国人，1904年被英国殖民部派往威海卫任职，1919年起任帝师。1922年初接受续聘后，庄士敦更多地扮演顾问的角色，逐渐取代陈宝琛成为溥仪“灵魂的一部分”。⑤庄士敦虽认为帝制合于中国国情，但主观上不希望溥仪卷入复辟的阴谋，面对派系之争，更多地是自成一体，择善而从。

内务府是逊清朝廷的核心机构，把握着经济命脉，同时承担“朝政”相关的事务。内务府大臣中的佩钥大臣地位最高，长期由世续担任。世续在辛亥年间首赞清帝逊位，丁巳复辟时又“惧祸及，力阻之”。⑥1922年1月世续去世后，绍英继任佩钥大臣。绍英，官至度支部大臣，1912年起任内务府大臣，软弱、谨慎，非领袖之才。此外，耆龄、宝熙、荣源在1916年、1922年、1923年相继成为内务府大臣。耆龄官至马兰镇总兵，任事颇勇。宝熙是地位较高的宗室，官至学部左侍郎，荣源是皇后婉容之父，官资不深，二人在位时间较短，能力较弱。

总体而言，溥仪“亲政”前，以载沣为首的王公亲贵、师傅与内务府大臣已形成一共同体，其主要目标是保护溥仪并维持“清室优待条件”，政治取向保守而谨慎。这是民初各类复辟活动失败后未累及清室的关键。有学者将民初复辟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分为四类：（1）宗社党人（善耆、溥伟、升允等）；（2）逊清遗老（郑孝胥、罗振玉等）；（3）康有为一系的保皇党分子；（4）旧官僚（张勋等）。⑦他们均属广义的“遗老”，在丁巳复辟结束后大多偃旗息鼓，游离于逊清朝廷之外。但是，溥仪春秋日盛又使他们看到得君行道的良机。正如遗老章梫所言：“上既明决，至真有事时，非诸老所能尼。嗣是机缘必能凑拍在两三年间，倘善承之，海内皆蒙福矣。”⑧

溥仪回忆道，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随着我的年岁渐长，与社会上的间接接触渐多，我却越发相信‘人心思旧’这句鬼话是真的”，其盼望成婚以摆脱“孩子似的管束”。⑨大婚于1921年初进入筹备阶段，至1922年12月告成。1921—1922年间，溥仪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而载沣、陈宝琛等人的约束力则持续下降。溥仪安装电话、剪去发辫、偷运文物，开始频繁会见社会人士，数次计划出宫，均发生在此期间，而其中大多数的行为是载沣、陈宝琛等人所反对的。

“摄政”格局因溥仪大婚后“亲政”而动摇。1921年9月27日，溥仪提出“嗣后折奏亦应

---

① 溥佳：《1924年溥仪出宫前后琐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266–267页。

② 溥仪：《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群众出版社，2013年，第55、101页。

③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1420页。

④ 周增光：《丁巳复辟中的逊清皇室与清遗民——兼论民初复辟行为的生存空间》，《史林》2022年第3期。

⑤ R.F.Johnston to Colonial Office, January 12, 1923, FO371/9216, p.72；溥仪：《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第107页。

⑥ 《清史稿》卷472《世续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2818–12819页。

⑦ 胡平生：《民国初年的复辟派》，第1–88页。

⑧ 王根法编：《翰逸神飞：章梫和他的书法艺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⑨ 溥仪：《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第96、108页。

给我看看”，逊清朝廷文书流转的规程遂改为“奏折请皇上先看，一面开具事由单，请王爷批回，再请上阅后传旨，如有拟谕旨之事，先将谕旨请皇上看后再为用宝”。[①] 大婚后数日，载沣主动提出归政，溥仪有意接受此请，后经师傅与内务府大臣的疏通方作罢。[②] 实际上，此后载沣已不便过度干涉“朝政”。庄士敦也提到溥仪在婚后权力大为增长。[③]

“在野”遗老在溥仪大婚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民国当局无力支付足额岁费，逊清朝廷长期依靠借款抵押度日，内务府仅拟用三十万两筹备婚典，与同、光二帝时所用相差悬殊，遗老有感于此，纷纷筹款报效。在金梁、罗振玉、刘承幹、温肃、胡嗣瑗等人的组织下，贡金最终达到三十万两之多。[④] 大婚也使得遗老有机会瞻仰天颜。刘承幹受到溥仪召见，其日记记道：“上曰，汝等远道来京，且又贡银，朕心甚不安。……（上）又曰，他们此刻弄得甚糟。对曰，是以南方臣民均望皇上中兴，庶可大定。”[⑤] 宗社党成员、前陕甘总督升允本已与溥仪君臣相隔十余载，而在大婚典礼前一日被溥仪召见，“赐座赐茶，并赐朝马”，后奏谢称“恭睹大婚礼成，中外相庆，人心所向，天意可知”。[⑥] 溥仪大婚时“凡贡贺人员，均有回赏书画物品”，更是普洒“天恩”。[⑦] 为鼓励报效，遗老甚至要求逊清朝廷违背《巩固清皇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回赏官衔。对于这一要求，载沣态度游移，绍英与耆龄也不予支持。[⑧]

总之，1922 年前后溥仪自主性的增强已为其与“在野”遗老的进一步合作埋下伏笔。当然，逊清朝廷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加速这一进程的重要原因。1922 年 5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退居关外，徐世昌下台，新近控制北京政府的曹锟、吴佩孚、黎元洪与清室的关系较为疏离。1922 年 8 月，被张勋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复会，议员多次提出重订优待条件，接收紫禁城并限制宫内古物流出。这是逊清朝廷的旧臣所难以应付的，同时也刺激着溥仪与遗老有所作为。

二、改革、政争与遗老的进用

溥仪的“初政”不限于摆脱自身的束缚，也体现在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应对宫廷内部的经费支绌与外部压力。改革势必牵涉到用人，而“在野”遗老正是溥仪的可用之才。部分遗老进入逊清朝廷后即因政见与利益的不同互相倾轧，这已非年轻的溥仪所能控制。至于逊清朝廷的旧臣则日益边缘化，其中一部分又与朝中新人勾连，进而加剧内部的混乱。

（一）1922 年清理皇产风波

庄士敦对于溥仪作用重要，其能够成为帝师是出自遗老李经迈的举荐，李在辛亥革命期间避难于威海卫，因而结识在此任职的庄。[⑨] 这一举荐通过溥仪的七叔、宗人府宗令载涛上达逊清朝廷，并由其负责疏通载沣等人，办理相关事项。载涛与李经迈过从甚密，清末前者赴欧考察陆军时，后者是首席随员，入民国后，二人年年会面。[⑩] 李经迈举荐庄士敦用意深远，希望借此

---

①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8 年，第 529 页。

②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575、576 页。

③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29 页。

④ 金梁：《瓜圃丛刊叙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287 册，文海出版社，1965 年，第 48–49 页。

⑤ 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第 7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年，第 146 页。

⑥ 升允：《遵旨陈言疏》（壬戌年十一月），《升罗悖语》，《近代史资料》139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26–127 页。

⑦ 金梁：《瓜圃丛刊叙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287 册，第 50 页。

⑧ 王继雄整理：《求恕斋函稿·致罗振玉》（1922 年 8 月 14 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 19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12 页；罗振玉、王国维著，王庆祥、萧立文校注，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548 页。

⑨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 97 页。

⑩ 溥佳：《清宫见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第 2、4 页。

向欧洲各国展现“主人之英明”，使“将来外人回心向之，与我有成”。[①]

1921 年初，李经迈与郑孝胥致信师傅与内务府大臣，推举载涛与金梁清查皇室产业。[②] 对此，世续与绍英感到“碍难着手”，不过溥仪却“心焉识之”。[③] 次年 5 月，溥仪派陈宝琛、李经迈、绍英、耆龄与宝熙清理皇产，后又加派刘体乾。[④] 这也离不开庄士敦的擘画，李、刘均出自其举荐。[⑤] 溥仪信任庄，乃至因续聘庄而赏李太保衔。[⑥] 刘体乾则有“媚臧斯敦以求清理皇产大臣”之举。[⑦] 刘体乾与李经迈为世交，前者之父刘秉璋与后者之父李鸿章同为淮系大员。刘体乾娶李鸿章的侄女；刘秉璋之长女、次女均嫁李经迈之兄李经方。庄士敦主张清理皇产以减少花销，溥仪先行搬至颐和园居住，在与民国政府协商修改优待条件、放弃尊号与优待费后，前往欧美留学。李经迈与刘体乾支持清理皇产，但作为遗老的他们并不赞同放弃尊号。[⑧]

清理皇产收效甚微，不了了之。李经迈因徐世昌反对而未赴任。[⑨] 刘体乾资望不足，作用有限，庄原拟进一步任刘为内务府大臣，遭到载沣与朱益藩的反对而作罢。[⑩] 刘体乾之进用受阻也与总统徐世昌的态度有关，徐早已向绍英与耆龄表示世续去世后不宜新增内务府大臣。[⑪] 载沣等人不大可能公然违抗其意旨。

（二）1923 年加派南书房行走及废除宦官后遗老的活动

清理皇产并未过多改变逊清朝廷高层的构成，更多的遗老是由加派各类“行走”而入朝的。溥仪大婚前后，不少遗老主张设立各类辅政机构。热衷复辟的张勋与升允分别奏请添派南书房、上书房行走。[⑫] 综合二者意见，1923 年 4 月 16 日溥仪正式下旨，加派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在南书房行走。[⑬] 杨钟羲由陈宝琛所荐，景方昶由朱益藩所荐，温肃“以曾客张勋所召用”（荐主可能是陈宝琛），王国维由升允所荐。[⑭]

张勋与升允此奏背后有罗振玉的运作。[⑮] 升允深受罗振玉敬佩，1922 年后二人共居天津，升允贫困，受罗接济。[⑯] 升允的女婿溥儒是清室近支，便于面见溥仪。不过，除与其过从甚密的王国维外，罗振玉在朝中的奥援并不多，其向王坦言“都中舍公与凤老（柯劭忞）外，实无弟（第）三人可共语”。[⑰] 柯劭忞年逾古稀，尚处“在野”状态。此外，沈曾植与张勋也是罗振玉交好的对象，但二人在 1922 年 11 月、1923 年 9 月相继去世。

对于王国维入直南书房，罗振玉寄予厚望；王入都后，罗又在幕后不断运动王上奏言事。不过，王国维缺乏政治野心与手段，在朝中颇为孤立。添派的南书房行走中，温肃、景方昶与

---

① 王益和：《庄士敦授读与康有为复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注释：《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第 780 页。

②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857 页。

③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505 页；陈星整理：《陈宝琛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396 页。

④ 裘陈江整理：《耆龄日记》，凤凰出版社，2020 年，第 184 页；王庆祥整理注释：《溥仪文存》，群众出版社，2017 年，第 38 页。

⑤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 167 页。

⑥ 王庆祥整理注释：《溥仪文存》，第 39 页。

⑦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1908 页。

⑧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 163−169 页。

⑨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42 页。

⑩ 裘陈江整理：《耆龄日记》，第 180 页；《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47 页。

⑪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552 页。

⑫ 胡嗣瑗：《甲子蒙难纪要》，《近代史资料》83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95 页。

⑬ 王庆祥整理注释：《溥仪文存》，第 43 页。按，南书房行走原有袁励准与朱汝珍。

⑭ 胡嗣瑗：《甲子蒙难纪要》，《近代史资料》83 号，第 95 页。

⑮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64 页。

⑯ 罗振玉著、罗继祖主编：《集蓼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67 页。

⑰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608 页。

王国维不甚熟稔。[1]杨钟羲也有拒绝与王联衔上奏之举。[2]内务府大臣耆龄认为王国维不过是“村学究”。[3]对于升允觐见溥仪与托溥儒上书的计划，陈宝琛与朱益藩也力图阻挠。[4]升允秘请溥仪对宗亲“不宜假以事权”，并将亡国诿罪于载泽、载洵、载涛等人，说明罗振玉一系的遗老与王公亲贵的关系也颇为疏离。[5]

南书房诸臣的日常工作是查检景阳宫等处书籍。由此，罗振玉“知圣意仍欲立图书馆、博物馆”。[6]溥仪的真实用意未必在此，但设立两馆的确是罗振玉一系遗老的核心主张。这既是为解决经费问题，也是为遏制民国当局的“野心”。具体而言，罗振玉、升允主张设两馆于闲置的奥国使馆，借助外力掌握古物的支配权；王国维则倾向于开放部分禁城离宫，使万国有保卫之责。同时，罗振玉等人反对大举裁员、溥仪出国留学与自废优待条件（主要是尊号与优待费），认为如此无异于化国为家。[7]这与庄士敦的主张全然相反，故罗振玉称“腹心之害，日益加甚，皆外傅阶之”。[8]对清理皇产中同庄士敦合作的李经迈与刘体乾，罗振玉亦无好感，称：“至于南中野心家，岂仅一贡父（刘体乾），而彼西平（李经迈）者，亦全无心肝。”[9]

1923 年建福宫火灾后废除宦官是宫廷改革中的重要事件。此举“自醇邸、师傅以次，莫不力阻”，但溥仪“力行之”。[10]这是受一向厌恶宦官的庄士敦长期影响的结果。张勋等人因火灾而“纷纷具疏慰问”，为此溥仪特意下旨：“嗣后，凡有见闻，尽可据实敷陈，毋有所隐，以称朕乐闻直言之意。”[11]罗振玉一系的遗老由废除宦官之举认定“庄说既行，则以后仍有动作，不外撤号及出游二事”，开始加速运作，谋求抵制。[12]郑孝胥一贯主张废除宦官，1923 年 8 月，郑孝胥接受溥仪召对，这是其在民国年间首次入都。溥仪对郑孝胥印象颇佳，向陈宝琛言道：“郑孝胥殊不老。闻其言论，使我气壮。吾目中未尝见如此人，惜不能常见之耳。”[13]这为溥仪与郑孝胥之后的行动埋下伏笔。罗振玉与郑孝胥虽相识颇早，且二人的兄弟为亲家，但此时在废除宦官等问题上出现较大分歧，故罗知郑有入京之举后向王国维言道：“此老所见，与吾辈颇殊，良可注意也”。[14]罗、郑二系并立之势已隐约可见。

（三）1924 年内务府改革

进入 1924 年后，遗老进一步包围溥仪而政争也不断升级。2 月 16 日，溥仪派郑孝胥在懋勤殿行走，赏戴花翎，同日又派萧丙炎在南书房行走，赏罗振玉在紫禁城内骑马。[15]戊戌年间，光绪帝即欲从康有为之议开懋勤殿，以此作为领导变法的实权机构。对此，郑孝胥是颇为熟悉的。3 月 3 日，郑孝胥与其所保的金梁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同时郑获赏头品顶戴。两日后，绍英请

①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62 页。
② 胡嗣瑗：《甲子蒙难纪要》，《近代史资料》83 号，第 95 页。
③ 裘陈江整理：《耆龄日记》，第 249 页。
④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88、603 页。
⑤ 升允：《密献刍言疏》（癸亥年七月），《升罗悖语》，《近代史资料》139 号，第 129 页。
⑥ 罗振玉：《集蓼编》，第 69 页。
⑦ 升允：《升罗悖语》，《近代史资料》139 号，第 124–130、181–183、188–189 页；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 14 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215–218 页；《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42–543、577 页。
⑧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33 页。
⑨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42 页。
⑩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1958 页。
⑪ 王庆祥整理注释：《溥仪文存》，第 44 页。
⑫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81 页。
⑬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1960 页。
⑭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588 页。
⑮ 王庆祥整理注释：《溥仪文存》，第 57 页。

派郑孝胥佩带内务府印钥，溥仪应允。[①]

任命郑孝胥一方面是因溥仪改革之心迫切，另一方面则出自陈宝琛与庄士敦的推举。陈宝琛与郑孝胥为闽县同乡，渊源颇深。另外，郑孝胥重用的内务府堂郎中佟济煦是陈宝琛的弟子，也可证明此时二人关系密切。庄士敦在改革思路上与郑孝胥接近，接受溥仪询问时称郑是其在中国 25 年间最为佩服的人。[②]

郑孝胥上任后即欲大举改革，认为当务之急是分三期清理财政，其中第一期的主要任务是筹款，包括裁减与变价两方面。[③] 具体而言，“裁减”是指各处官员裁撤十分之七，内务府分四科治事，每年经费压缩至五十万两；“变价”是指更大规模地抵押拍卖房产与古物。为开源节流，郑孝胥还主张将文渊阁的《四库全书》运至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复印，保举三多办理盛京内务府皇产事宜，任命庄士敦管理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④] 金梁的主张是“筹清理”、“重保护”与“图恢复”。“筹清理”包括“清地产”与“清宝物”，其中“清宝物”有别于“零星典售”；“重保护”主要指清室自办博物馆，并与“友邦”合作；“图恢复”则意在复辟，要求溥仪“求贤才，收人心，联友邦”。[⑤]

郑孝胥的改革倾向激进，不过其立足未稳之际尚能顾及部分旧臣的意见。郑孝胥本拟改内务府为内务处，但因陈宝琛不允而放弃上奏。[⑥] 从郑孝胥、绍英与耆龄的日记看，三人关系较为和睦，绍、耆尽管对郑的部分主张持保留态度，但早有退意，无心争权。但是，作为郑孝胥助手的金梁却制造出不少难题。金梁任职后频繁上奏，其中不少是单衔密奏，对此载沣颇为不满，“谕令日后有公事大家商议”。[⑦] 陈宝琛与朱益藩也为此深忧。[⑧] 在密奏中，金梁弹劾诸位旧臣，本寄予其厚望的溥仪对这一过激言论也“不甚以为然”。[⑨] 此外，金梁还将溥仪的朱谕登报，这一行为后被南书房行走温肃上奏揭发。[⑩] 载沣向郑孝胥提出金梁“不安分”，应劝告、监督，以免“因私误公”。[⑪] 在载沣眼中，郑、金之间是联为一气的，金的所作所为终会连及郑。在多方压力之下，金梁被派往热河清理皇产，其不愿接受这一任命并希望觐见溥仪，未获允。[⑫]

金梁失势后，郑孝胥孤掌难鸣。任命郑孝胥时，载沣即希望溥仪删去“总理内务府全权大臣”中的“全权”二字；郑孝胥推行裁员时，载沣又有意迁延；郑孝胥与民国当局沟通时，载沣则担心其言辞激烈。[⑬] 载洵与载涛也在金梁去职后提议罢免郑孝胥而任用赵尔巽以缓和民国当局的态度。[⑭] 与清室关系密切的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亦对郑孝胥的改革不满。[⑮] 溥仪对郑孝胥信赖有加，但客观上其激进的倾向与挥霍无度的作风也为改革平添出不少障碍。更令郑孝胥举步维艰的是，其抵押售卖古物等行径已造成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并引起民国当局的警觉与介入。

---

①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1987 页；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614–615 页。

②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 195 页。

③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1988 页。

④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1984、1990 页；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613、621、623–624 页。

⑤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上海书店，2000 年，第 108–114 页。

⑥ 王根法编:《翰逸神飞：章梫和他的书法艺术》，第 49 页。

⑦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617 页。

⑧ 裘陈江整理:《耆龄日记》，第 294–295 页。

⑨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620 页。

⑩ 温肃:《敬陈管见折》,《温文节公集》，学海书楼，2001 年，第 92 页；胡嗣瑗:《甲子蒙难纪要》,《近代史资料》83 号，第 96 页。

⑪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621 页。

⑫ 裘陈江整理:《耆龄日记》，第 301 页。

⑬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1987、2000 页；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625 页。

⑭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1998 页。

⑮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615–616 页。

1924 年 6 月 25 日，郑孝胥开缺，仍在懋勤殿行走，会同筹办内务府核减事宜。在载沣、绍英与郑孝胥的支持下，溥仪派朱益藩会同办理内务府事宜，印钥则仍由绍英佩带。[①] 郑孝胥多次自请开缺，而绍英、耆龄等人同样意兴阑珊，不过是碍于载沣之面苦撑。

郑孝胥一系权力收缩的同时，罗振玉一系的遗老在朝中的地位有所提升。1924 年 9 月，柯劭忞被派在懋勤殿行走，罗振玉则被派在南书房行走。[②] 罗振玉、王国维与升允对郑孝胥、金梁的表现极为不满，数次上奏弹劾。两派之间的矛盾首先在于前者认为后者在改革中盲目自信又过于激进，不应大肆售物与裁员。其次，对溥仪移居颐和园与出国留学，前者强烈反对，而后者持开放态度。最后，对于郑孝胥亲近吴佩孚之举，罗振玉等人并不认可，认为直奉战局已开，清室应处超然地位。[③]相对郑孝胥一系而言，罗振玉一系的遗老观念偏向保守，行事更显稳健。

罗振玉的进用一方面出自升允、王国维的力荐，另一方面则与内务府大臣荣源有关。荣源本支持郑孝胥，但因借款之事二人失和，由此，罗振玉认为荣源“无私心”，有意与其结交。[④] 郑孝胥主导的改革停滞后，荣源运出、抵押大量古物，此举招致绍英与耆龄的反对。[⑤] 在此过程中，荣源选择援引罗振玉，不过罗仍称“临大事我仍与立异，不失其为我”。[⑥]同时，庄士敦也开始主动通过徐良等人的引荐主动向罗振玉一系示好，罗一改此前的排斥态度，建议王国维时常见庄，之后，罗、庄又因租借玉泉山离宫等事有所合作。[⑦]

三、北府、使馆与天津：溥仪出宫后的抉择

1924 年 11 月 5 日，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宣称此举是为扫除复辟余孽，而溥仪“初政”正是刺激这一认知形成的关键。冯玉祥向部下提到：“至宣统终日在皇宫上朝下谕，民国何能容之，故命鹿旅长除此祸根。”[⑧]不过，溥仪出宫后，遗老包围溥仪之势未被遏制。溥仪离开紫禁城后即移居北府，受到军警监视。门禁先严后松，但溥仪的行动始终受限。在此期间，无论是郑孝胥、罗振玉等遗老，还是载沣等旧臣，都力图向外界求援，以改善溥仪的处境。但是，二者的目的、主张与行为方式却有明显区别。

溥仪出宫前不久，郑孝胥提出溥仪可往荷兰使馆避难。庄士敦认可这一方案，但荣源、朱益藩与载涛都持反对意见，因而此议未行。[⑨] 之后，日本兵营的竹本多吉大佐与陈宝琛及其外甥刘骧业取得联系，称“如宫中有警，可遣兵入卫”。溥仪获知这一消息后有意前往日本兵营，遂令与日方关系紧密的郑孝胥负责接洽。恰在此时，溥仪被逐出宫。郑孝胥闻知，即刻与刘骧业、竹本及日医前往北府，欲挟溥仪至医院；溥仪应允，但因风险过大而为载沣、载泽等人所阻。[⑩]金梁则鼓动溥仪“敝屣一切”，主动宣布放弃优待与帝号，捐出优待费与私产，

---

①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631、634 页。

②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2013、2014 页。

③ 升允：《升罗悖语》,《近代史资料》139 号，第 130–134、136–138、183–185 页；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 14 卷，第 220–223 页；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 203 页。

④《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611 页。

⑤《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622–623 页。

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633 页。

⑦《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 625、627–628、636 页。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 1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652 页。

⑨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2025 页。

⑩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2025–2026 页；李景铭：《六二回忆》,《近代史资料》133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92 页。

恢复自由后出国留学，以收拢人心，预备复辟。溥仪对出国留学颇为向往，因而赞同这一方案，但载沣、朱益藩等人反对贸然行动，出面干预，并监视金梁在北府的行动。①罗振玉一系的遗老同样频繁接触外国势力，对民国当局充满敌意。溥仪出宫后不久，罗振玉与溥儒即希望通过佟济煦请意大利武官出兵保护溥仪。②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时，罗振玉亦有怒斥驱逐溥仪出宫的民国要人之举。③

与郑孝胥等遗老相反，总体上，载沣、绍英等旧臣仍对民国当局优待清室抱有较大的希望，与外国势力的勾连也有限。11 月 8 日，国民军方面的要人鹿钟麟与张璧入北府会见溥仪，双方沟通顺畅，除荣源外，在场的王公亲贵均态度平和。三日后，载涛与摄阁总理黄郛接洽，在溥仪的安全问题上达成一致。④ 据绍英的日记记载，11 月 20 日前，清室方面尚能参与民国当局主导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而绍英也常请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协办各类善后事宜。11 月 22 日、24 日，段祺瑞、张作霖相继入京，段、张此时都倾向于恢复"清室优待条件"而反对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因此，载沣等王公亲贵寄予段、张厚望。

随着局势和缓，溥仪又蠢蠢欲动。11 月 29 日，溥仪逃出北府，前往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后又转移至日本使馆。陈宝琛与庄士敦是最初的策划者，一路随溥仪从北府到德国医院；郑孝胥则是支持溥仪前往日本使馆并负责与日方联络的关键人物，从德国医院到日本使馆由其一人护送。⑤ 载沣、绍英等事先并不知情。事发后，载沣与载涛劝溥仪回府，但溥仪不允。对于溥仪擅离北府，段祺瑞与张作霖均不以为然，尤其是张，对亲贵颇为责备。⑥ 溥仪进入使馆界的次日，庄士敦面见张作霖，"张怒庄以上适日馆，斥责甚厉"。奉系方面的日本参谋町野也向南书房行走袁励准"力言上不宜住使馆"。对此，袁及其"在廷同事"均表示反对，溥仪"亦决意暂住使馆，静候解决"。当日傍晚再次来到使馆的载沣与载涛则仍"求上从张作霖意"。⑦

载沣等人之所以反对溥仪移居日本使馆，很大程度上是因顾及段祺瑞与张作霖的态度，而溥仪与郑孝胥等遗老则怀疑段、张帮助清室的诚意与控制局势的能力。离开北府之前，溥仪向溥佳言道："我也考虑过，段、张的话也不能使人完全相信，一旦再有变化，再想走也走不成了。"⑧ 溥仪出宫之初，段祺瑞向郑孝胥表示自己可以尽力保全清室，但反对溥仪进入使馆，对此，郑认为"犹难恃以无恐"。⑨ 袁励准劝阻溥仪返回北府时也"以为一回必受奉军之包围，嗣后永无自由之日"。⑩

溥仪移居日本使馆后，随侍溥仪的任务主要由遗老承担。袁励准对比道："先是上在北府，系近支王、贝勒每日二三人招待至府请安者；此次上住使馆，近支王公以上未令预闻，无肯至使馆请安者。"正因如此，袁励准等南书房行走轮流在使馆值日，负责谢绝"不应见上者"。⑪ 溥佳前往日本使馆面见溥仪时也发现郑孝胥与罗振玉强势地把持着溥仪的一切事务，春节、万寿

---

①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 119–124 页。

②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 122 页。

③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2027 页。

④ 溥佳：《1924 年溥仪出宫前后琐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5 辑，第 252–255、259 页。

⑤ Reginald Johnston, 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 May 28, 1931, RIIA/8/145, Chatham House, London，pp.15–16；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2030–2031 页。

⑥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第 660 页。

⑦ 袁励准：《甲子日记》，王建朗、马忠文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57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 年，第 138–140 页；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2031 页。

⑧ 溥佳：《1924 年溥仪出宫前后琐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5 辑，第 271 页。

⑨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2026 页。

⑩ 袁励准：《甲子日记》，王建朗、马忠文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57 册，第 139 页。

⑪ 袁励准：《甲子日记》，王建朗、马忠文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57 册，第 141–142 页。

节时使馆内王公亲贵与遗老的数量形成鲜明对比。[①]

溥仪入使馆次日，罗振玉建议溥仪向外界宣称通过暴力胁迫片面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违法。这一建议得到溥仪认可，由此，罗振玉发现“请自辞优待解尊号者结舌；而谓与段交厚者潜襆被南归”。[②] 前者暗指金梁；后者则为郑孝胥，12 月 6 日离京赴沪。郑孝胥离开溥仪很大程度上是因受罗振玉的排挤，恰在郑出京前两日，升允应罗之请前往使馆，接受溥仪召对，其间表示出对郑的不满与对罗的推崇。[③] 在郑、罗之间，金梁倾向于前者，奏请劝回郑孝胥，溥仪应允，但郑仍持观望态度。[④] 同时，罗振玉仍受胡嗣瑗等遗老的制衡。

溥仪移居日本使馆后迫切地期待出国留学，同时因已暂脱险境而对民国当局颇为强硬，反对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一度主张全面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财政状况与舆论条件之下并不现实）。但是，筹集出国留学的资金仰赖民国当局，段祺瑞与日本等国公使又倾向于在出国留学前议定有关优待的条件，这使溥仪进退两难。[⑤]绍英、陈宝琛等旧臣更为务实，希望尽快与段祺瑞、孙中山等民国要人在优待清室问题上达成一致。[⑥]此后，受到罗振玉的鼓动，溥仪又欲罢免绍英等人而任命载润、朱汝珍、景方昶与温肃为内务府大臣。但是，载沣仍希望绍英、耆龄与宝熙维持现状，载润也不愿与“躁进”的遗老朱、景、温共事，而陈宝琛与朱益藩亦持反对意见。[⑦]

为迎合溥仪出国留学的迫切要求，减少民国当局的阻力，罗振玉转而支持溥仪致书段祺瑞，自消尊号，放弃优待，胡嗣瑗“力斥之乃止”。[⑧] 因段祺瑞与日本公使对溥仪出国留学不置可否，罗振玉又秘派升允之子际彪与陈毅前往日本，希望直接取得日本皇室与政府的支持，不过二人最终无功而返。郑孝胥与胡嗣瑗虽不反对溥仪出国留学，但并不认可罗振玉这一举动。[⑨]

为预备出国及应对日益激进的舆论，1925 年 2 月 23 日夜，溥仪秘密离开日本使馆，移居天津日租界。此事仅罗振玉与朱汝珍知情，罗是谋划者与随行者，而朱则是南书房行走中与罗关系较密者，负责在津租屋。[⑩] 师傅与内务府大臣事先“多不谓然”。[⑪] 庄士敦也认为溥仪应听从段祺瑞的建议继续留在日本使馆，而出国即有叛国之嫌。[⑫] 之后，亲贵王公与绍英、耆龄、宝熙等人留京善后，而溥仪在天津的行在被遗老团团包围。[⑬] 不过，随着郑孝胥的归来与胡嗣瑗的发迹及王国维在京任教，罗振玉一系的遗老无法完全操纵溥仪，留学计划最终也未能成行。溥仪成为寓公，在各派遗老间摇摆，直到伪满洲国成立。

---

① 溥佳：《1924 年溥仪出宫前后琐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5 辑，第 274–276 页。

② 《升罗悖语》，《近代史资料》139 号，第 186–187 页。

③ 袁励准：《甲子日记》，王建朗、马忠文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57 册，第 143–144 页；溥仪：《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第 160–161 页。

④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第 128–129 页；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2033–2035。

⑤ 袁励准：《甲子日记》，王建朗、马忠文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57 册，第 152–153 页；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2037 页。

⑥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664–665、667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历史档案》2000 年第 1 期。

⑦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675–676 页；胡嗣瑗：《甲子蒙难纪要》，《近代史资料》83 号，第 102 页。

⑧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2042 页。

⑨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4 册，第 2041–2042 页；胡嗣瑗：《甲子蒙难纪要》，《近代史资料》83 号，第 101 页。

⑩ 袁励准：《甲子日记》，王建朗、马忠文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57 册，第 173 页；罗振玉：《集蓼编》，第 74–75 页。

⑪ 袁励准：《甲子日记》，王建朗、马忠文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57 册，第 172 页。

⑫ Memorandum by Johnston, February 24，1925, FO371/10918, p13.

⑬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下册，第 679 页。

四、结语

1922—1924 年的逊清朝廷实际上已处于内外交困之境。从内部而论，1922 年之前，以载沣为首的王公亲贵、师傅与内务府大臣共同组成逊清朝廷的高层，政治取向保守而谨慎，尚能与“在野”遗老及复辟活动保持一定距离。1922 年之后，由于溥仪开始“亲政”，欲有所作为，部分富有政治野心的遗老受到溥仪信赖，涌入逊清朝廷，形成派系倾轧的局面，而载沣、绍英等旧臣则逐渐边缘化（陈宝琛等人此时与遗老也有所勾连）。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溥仪出宫以后。正因如此，溥仪未遵循民国当局的意愿长居北府或颐和园，而是选择托庇于列强的权势之下。不少研究者强调驱逐溥仪出宫与伪满洲国建立的关联性，而较少关注逊清朝廷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其实出宫以前，伪满骨干郑孝胥、罗振玉等具有复辟倾向的遗老已活跃于“朝堂”之上，受到溥仪重用，伪满政权中郑、罗二系并峙的格局也已初步显现。恰恰是溥仪“亲政”前掌控逊清朝廷的载沣、载涛、陈宝琛、朱益藩等人没有彻底沦为“汉奸”。换言之，不论民国方面驱逐溥仪出宫是否符合“法理”，也不论出宫前清室的活动是否构成实质上的“复辟”，溥仪与部分遗老再次共同走向复辟的隐患都早已埋下。

References

Hu Pingsheng. *Minguo chuqi de fubipai* (People who supported restor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aibei: Taiwan xuesheng shuju, 1985.

Li Zaiquan.“1924—1925nian sunzhongshan beishang jingjin yu xunqinghuangshi de fanying” (Sun Yat-sen Trip to Beijing and Tianjin (1924—1925) and Abdicated Qing Royal Family’s Response). *Shilin* (Historical Review) 1 (2022).

Puyi’s “Early Administr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Abdicated Qing Court’s Political Situation from 1922 to 1924 and the Expel of Deposed Puyi

YANG Yifan（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2101110823@pku.edu.cn）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enior officials of the abdicated Qing court were composed of the nobility headed by Zaifeng, Puyi’s biological father, masters and ministers of the Ministry of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for a long time.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tended to be conservative and rigorous which led them to keep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idle old fogies and restoration. However, as Puyi came to power, this structure was gradually destroyed. Zheng Xiaoxu, Luo Zhenyu and other politically ambitious and restoration−oriented old fogies were trusted by Puyi, and they poured into the abdicated Qing court one after another in activities such as the liquidations of the imperial property, the reinforce of South Study Special Aide, and the reform of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forming a situation of scramble for power, while Zai Feng and other veteran ministers were gradually marginalized. This tendency continued until Puyi left the Palace in 1924. Discussions on the expel of deposed Puyi and restoration cannot be limited to the“jurisprudence”, but also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in the the abdicated Qing court’s power structure after 1922.

Keywords: the abdicated Qing Dynasty, the expel of deposed Puyi, adher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